

TONG
HUA



新美南吉

(日) 新美南吉 著

童话

希望出版社



新美南吉童话

(日) 新美南吉 著

刘迎 译

希望出版社

新美南吉童话

刘迎 译

*

希望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69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 字数:234千字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册

*

ISBN 7-5379-2230-6/I·270

定价:23.00元

序

此次，由于中国矿业大学刘迎先生的不懈努力，日本童话作家新美南吉的作品被译成中文，终于付梓出版了。中国的朋友们，特别是孩子们可以通过这本书欣赏到新美南吉的童话作品，对此我甚感欣慰。

新美南吉，1913年出生在位于日本中央的爱知县半田市。幼时起，亲近于文学，是个善于用恳切温和的目光观察自然和生命的少年。在东京就读大学时，他与众多的文人进行交流，并勤勉于文笔活动，但因身患结核，不得已返回了故乡。其后，他在故乡执掌教鞭。在指导孩子们的同时，不断地创作童话作品。但是在1943年，年仅30岁的新美南吉便溘然去逝，令人痛惜。

养育新美南吉的土地，那时是有着丰沃田园和

起伏丘陵的广阔农村。这本书中所介绍的《小狐狸阿权》、《拴牛的山茶树》等新美南吉作品中出现的风景，都与半田的风景相吻合。

1993年5月27日，半田市与江苏省徐州市结为友好城市。当时，我们访问了中国矿业大学，在那里幸会刘迎先生。此次幸会的收获，就是这本《新美南吉童话》的出版。我确信这是日中两国文化交流值得称颂的成果之一。我衷心地祝愿有更多的中国朋友通过这本书，了解新美南吉童话的纯真和精彩，永读不衰。并且期望这本书成为架起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心灵沟通的桥梁。

最后，谨向为本书的翻译付诸辛勤劳动的刘迎先生深表谢意。

日本国爱知县半田市市长 竹内弘

1995年4月12日

前 言

新美南吉的名字将永远载入日本儿童文学史册。他将自己短暂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儿童文学事业，创作了大量情节性强、乡土气息浓郁的优秀作品，构筑起一座具有独特风格的南吉童话王国，成为日本儿童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新美南吉（1913～1943），出生于日本爱知县知多郡半田町（今半田市）。原名渡边正八。新美是其母亲的姓。南吉四岁时，母亲因病去世，所以他从小就没有充分感受到母爱的温暖。五岁时，父亲娶了继母。八岁时，父亲与继母协议离婚，于是他被生母的娘家新美家收为养子，改姓新美。由于不堪忍受孤独和寂寞，数月后又逃回父亲身边。这段时期错综多变的家庭环境，给他多愁善感的幼小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并且直接反映到他以后的文学

作品中。1932年，南吉就读于东京外国语学校英文专业。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担任了中、小学教师。

南吉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了儿童文学创作。他广泛阅读了童话、童谣、诗歌和小说，与高年级同学一起创办同人杂志《猎户星座》，发表了许多以自然界、动植物、日常生活等为题材的童谣作品，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儿童文学的创作中。他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的作品包含了我的天性、性情和远大的理想。……假如几百年几千年后，我的作品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同，那么我就可以从中获得第二次生命。从这一点上来说，我是多么幸福啊！”从此，他与儿童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9年初，南吉向《红鸟》杂志投寄了许多童谣和童话作品。1931年，中学毕业后，在岩滑小学担任临时教员的南吉，在《红鸟》杂志上发表了处女童话《正坊和阿黑》，博得铃木三重吉的赏识。以后在该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小狐狸阿权》（1932）、《小狐狸买手套》（1933）、《红蜡烛》（1935）、《久助的故事》（1939）、《最后一个胡琴手》（1939）、《河》（1940）、《和太郎和牛》（1942）等大量的童话作品，成为第二批《红鸟》杂志出身的杰出作家之

一。

在东京就学时期，南吉广泛地与巽圣歌，与田准一、河合弘等众多文人进行交流，并拜北原白秋和铃木三重吉为师，如饥似渴地汲取文学知识，勤勉于文学活动，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6年，南吉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英文专业。因身患结核，不得已返回故乡，在中、小学执掌教鞭。指导孩子们的同时，他创作了大量的童话作品，刊登在当时颇具影响的儿童文学杂志上，如《红鸟》、《新儿童文化》、《小国民之友》等，引起巨大的反响，一跃成为与小川未明、坪田让治等儿童文学大家齐名的童话作家。1942年，他第一本童话集《爷爷的煤油灯》出版。正当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时，病魔缠身，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终于在1943年3月，因患咽喉结核离开人世，年仅三十岁。他的去世是日本儿童文学界的一大损失，也为热爱他及他的作品日本儿童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后来，他的师友巽圣歌、与田准一等人，将南吉的作品汇编成册，先后出版了《拴牛的山茶树》（1943）、《花树村和盗贼》（1943）、《大冈越前守》（1944）、《葬花》（1946）、《和太郎和牛》（1946）等童话集，在日本掀起了一股南吉童话热。继而，《新美南吉童话全

集》三卷（1960）和《校定新美南吉全集》十二卷、别卷二（1980）的问世，使南吉童话的普及和研究达到了空前的高潮。他的童话被选入日本中、小学语文课本，为日本少年儿童所熟悉和喜爱。

在南吉的家乡爱知县半田市，从1961年起成立了“半田市新美南吉显彰会”，并设立了“新美南吉文学奖”，以纪念这位杰出的童话作家，弘扬他的精神和文学。继而于1994年3月，值新美南吉诞辰八十周年暨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建成了规模宏大的新美南吉纪念馆，使半田市成为新美南吉的研究中心。

新美南吉生活的年代，特别是他从事文学创作时代，正值日本奉行对外扩张侵略政策，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法西斯主义肆意横行的黑暗时期。在这一形势下，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言论都发生了急剧变化。作为儿童文化主体的儿童文学也难以幸免，被迫迎来了窒息的非文学时期。大批儿童文学作家完全失去了言论和行动的自由，他们被征用，派往前线作战况报道或创作为侵略战争歌功颂德的作品。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岛健藏痛感到这时“文艺专意地生存，对我而言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南吉始终坚持不与军国主义为伍，

没有创作积极赞美侵略战争的作品，而是采取了回避现实，仅注重人物的刻画描写，追求艺术完美性，或者创作回想题材作品的消极态度。

南吉的起点是童话作家，其作品以童话为主，共计有一百一十篇之多，但同时他又是儿童小说家，集中创作了许多描写根植于少年时期心理活动和乡土现实的生活情感，具有浓厚的自传性色彩的少年小说。他善于使用小说的手法创作童话，又将童话的特质注入小说之中，融两者于一炉，从而形成了南吉文学特有的风格。因此，他的童话和小说的世界极其接近，很难在两者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来。

南吉短暂的创作生涯概括起来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时期。第一期是早期浪漫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具有两个特色：（一）多取材于民间故事或传说，描写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交流和平民百姓的感受，充分体现出《红鸟》杂志的风格。如《正坊和阿黑》、《小狐狸阿权》、《钱坊》等。（二）异国情调或改写外国童话的倾向浓烈。如《山坡上的铜像》、《无名指的故事》等。第二期是自传性色彩的生活童话时期，以少年小说为中心。这一时期开始从《红鸟》式的浪漫主义向描写儿童生活的现实主义转化。主要作品有《久助的故事》、《瘰子》、《屁》、《河》、

《谎言》、《贫穷少年的故事》等，在南吉文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第三期是幻想童话时期。他尽管意识到死亡即将来临，但仍然充满热情地投身于童话创作。这时的作品表明南吉已经完全具备了作为童话作家的资质。早期童话表现出的文学青年的稚嫩，已经荡然无存，文体格调达到了至善至美。这一时期的作品可以分成两大类，即人生派作品和道德观作品。前者充满理智、富有哲理，运用小说的手法，使人痛感到了人生的艰辛。如《爷爷的煤油灯》、《拴牛的山茶树》、《最后一个胡琴手》等。后者则将明快的幽默和淡淡的哀愁交织在一起，发人深思。如《和太郎和牛》、《花树村和盗贼》等。

纵观新美南吉的作品，不难看出幼时的经历对他的性格和创作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南吉文学的基础和出发点。南吉在二十八岁（1941）时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不曾被爱过，故不懂得去爱。没有加热的物体，何以能变得温暖呢？因此，孤儿无论是孩提之时还是成年之后，都是不幸的。”这里的“不曾被爱过，故不懂得去爱”表现了他幼时的孤寂感和隔绝感，反映到文学上，便形成了南吉文学的两大主题。

（一）忍受无法解脱的悲哀的文学

南吉是位感觉十分细腻，有着极易受伤性格的作家。他认为人类生存的前提，就是要忍受悲哀。《蜗牛的悲哀》是一篇很短的幼年童话，情节也非常简单。知道自己的躯壳里充满悲哀的蜗牛，为了寻找解脱的方法，四处求教。可是所有的蜗牛都回答说自己也陷入了悲哀中，帮不了它。最后这只蜗牛终于认识到：“悲哀，谁都有呀！不光我一个。我必须忍受自己的悲哀！”这是生存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悲哀，自己必须忍受。作者通过童话的形式，把自己心中的悲哀形象地表现出来了。

表现这一主题最典型的作品是《久助的故事》。写的是被规定放学后做作业的久助，终于做完，来到外面玩耍，可是到处都找不到一个小伙伴。后来，他遇见了牛皮大王兵太郎，两个人相互扭打戏耍起来。兵太郎用力很大，久助便怀疑兵太郎可能是动真格的。兵太郎从下面推开久助时，在久助的胸口上狠狠地打了一拳。久助顿时觉得头晕目眩，眼前的兵太郎简直判若两人了。南吉在结尾写道：“……可是打着以后，久助便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即使我最最了解的人，有时也会变得如同陌生人，而且我甚至弄不清自己是否真正了解那个人。对于久助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悲哀。”这种悲哀和蜗牛的一模一样，整个作

品没有一点色彩，如同底片中的世界，简直就是一幅自我意识的地狱图。忍受无法解脱的悲哀，就意味着自我与他人处于一种隔绝的状态中，两者是不能结合的孤独的存在。这就是南吉真正的人生观。

然而，南吉并没有沉迷于孤寂感和隔绝感之中，他对于隔绝的自我觉醒，使他不断地鞭策自己要千方百计努力去超越和克服孤寂与隔绝，“懂得去爱”“变得温暖”，于是寻求与他人结合的主题由此产生了。

（二）求爱（结合）的文学

南吉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孤独的存在，并非轻而易举就能相互结合的。而“爱”则起到了使其实现结合的桥梁作用，因此，“求爱”和“求结合”是意义相等的概念。

南吉对爱的希求从一开始就是悲剧性的。他的代表作《小狐狸阿权》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短篇童话《小狐狸阿权》描写的是独自生活在山林中的小狐狸阿权，生性顽皮，善于做恶作剧。有时把地里的山芋刨得乱七八糟，有时把农民挂的辣椒揪下来。有一次，阿权把兵十辛辛苦苦捕捞的鱼儿全都放跑了。十天后，阿权得知兵十的妈妈去世，对自己的淘气很是后悔。为了补偿自己的过错，从此以

后，阿权每天给兵十家送去栗子、蘑菇等食物。兵十却以为是神的恩赐。一天，阿权又带着栗子去兵十家，被兵十发现，误以为阿权又来捣乱，拿起火绳枪把阿权打死了。后来兵十才明白一直给自己送栗子、蘑菇的原来是阿权，追悔不已。作品的最后通过阿权的死，使两者实现了结合。作品以死为代价，描写了“生存所属不同”的世界中，人与动物相互间所产生的心灵的共鸣。

作为求爱的理想形象，南吉塑造了许多善良的人物，倾注了他全部的爱。如《最后一个胡琴手》的主人公木之助，是个在文明开化时代仍然以拉胡琴为生的人物。由于生活窘困和时势变迁所迫，他不得已把心爱的旧胡琴低价押给当铺。可是当他想重新赎回时，那把旧胡琴已经被标上了很高的价钱。最后，木之助沮丧、失落地离开了。南吉在结尾这样写道：“……下午三点钟左右，天空又阴了下来，街上寒气袭人。脚趾冻僵的麻木感很快传遍了全身。木之助低头躬着腰，慢慢地往家走去。”这种气氛上的渲染，表明了当时的社会中，人们的善意或心灵上的结合只能勉强地维系，最后终将破灭的事实。在南吉的笔下，这类善良的人物还有《爷爷的煤油灯》的己之介、《花树村和盗贼》的盗贼、《和太郎和牛》的和太

郎、《拴牛的山茶树》的海藏等等。他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极为平凡的人。他们心地善良，为人坦诚热情，渴望与他人疏通感情，希望获得社会的理解和帮助。可是他们的这种善意和愿望非但得不到理解和帮助，甚至经常受到轻视和伤害。由此可见，南吉所强调的“求爱（结合）”仅仅停留在愿望、理想上，缺乏至关重要的具体行动。

当然，南吉的晚期作品在表现方面偶尔也展示出一些主观能动性。如《去年的树》、《拴牛的山茶树》、《鸟山鸟右卫门》等，用将善意隐藏在心灵深处，最后以破灭的形式加以表现的人物形象，向将善意付诸于行动，以寻求与他人结合的形式的人物形象靠近。但是这些作品数量很少，而且行动的能力显得软弱贫乏，微不足道。从总体上看，南吉笔下的人物形象多是消极的、被动的。究其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南吉自身的内在原因所致。南吉在感觉上过于敏感，性格细腻且脆弱，又体弱多病，缺乏向外运动（求爱）的能量。二是南吉所处的时代对他起到了巨大的约束力。当时正值疯狂的战争时期，在国家管制下，儿童文化成为宣扬战争、鼓吹侵略意志的工具，任何变革思想或动向都受到扼杀。在这种艰难严酷的外部环境中，南吉的心中

承负着沉重的压抑感，不能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和观点。他曾于1941年撰文指出：“我向来主张童话作家首先必须是成人文学作家，而成人文学作家首先必须是一个卓越的、具备各种常识的人。写童话尽管有不少难点，但那种随处可见，如同贴邮票似的附上爱国主义标签的作品、充满橘子水味的伤感作品，以及仅像猪尾巴那样显示些许童心的作品，却硬要把它吹得天花乱坠，这或许是因为这些作家并非像莫罗阿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当不了成人文学作家才成为童话作家’的窝囊废吧。”

“不可否认，我读过的这些作品中，对我来说确实也有值得一读的东西。但让我国的儿童读这些作品是否果真能够理解，就值得怀疑了。”

“恕我寡闻，我国儿童中有许多人似乎同年长者一样，与其说是用‘头脑’不如说是用‘心灵’来读作品的。如此看来，把这类童话赐予他们也许并无什么意义。因为这些读物仅是靠‘头脑’而不是用‘心灵’写就的。”

因此，南吉为了坚守儿童文学阵地，不与军国主义分子同流合污，采取了回避现实、仅注重作品的形象性或艺术性的消极抵抗的态度，创作了许多描写生活平安时期美好回忆的回想题材的作品，如

《拴牛的山茶树》、《耳朵》、《爷爷的煤油灯》等。

南吉自幼就善于用恳切温和的目光观察自然与生命，他的童话通过孩子的眼睛，真实地把握成长时期的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变化，并且通过独特细腻的笔触，使它们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他的童话情节安排得合理巧妙，层次起伏鲜明，想像力丰富，再加上幽默的地方风俗，浓郁的乡土气息，趣味独特的语调文体，以善意和爱为基调的人道主义，以及“虽生存所属不相同，但灵魂交流相共鸣”的主题，都体现了南吉所处的时代和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克制，具有超越时代、超越现实的特征。南吉一生贫寒，生活极不稳定，他拼命努力，志向从“不幸”转变成“幸福”，是一位上升型作家。这种奋发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无疑为日本孩子们树立了榜样，从而博得了众多小读者的欢迎。日本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鸟越信评价说：“三十岁年轻轻就去世的新美南吉，是我在日本儿童文学家中最喜爱、最有吸引力的一位作家。不仅我一个人，近来成为议论话题的《儿童与文学》（石井桃子等编）中，南吉被铃木晋一作了几几乎近于满分的评价。甚至宣布要‘否定一切’的佐佐木守也认为南吉是不能与日本近代童话